

對自己的一字一句要求甚為嚴謹，讀他的散文便可知他的寫作態度，是規行矩步，不標新立異；他認為文章的好壞倒在其次，但一定要使讀者都能懂。文學是大眾的公器，既然把作品發表，必要求它能够與大眾交融成一片。如果作品本身晦澀在先，作者又拒絕讓讀者瞭解，這種態度足以戕害文學的生命。季薇所要追求的目標，便是努力克服形形色色的文字障，任何題材到了他的筆尖，都能够成為一篇清爽明朗的散文，使讀者能享有文章裏面的世界。

他堅信：「中國人，一定要能够精確而純熟地使用中國的語言和文字來表情達意；無論從事什麼行業，有一點散文的修養，總是好的。」他積極地從事散文的創作，主要的是為了提供一點範例，做為一般讀者的借鏡，大家能够純熟地運用本國文字寫文章，則民族文學才能順利地建立起來，他的這段話可謂用心良苦。

二十年來，他已印了八冊單行本，包括創作、理論和批評。目前，還有兩本書已經着手編輯，其中有一部是自選集。不過，由於受到紙張價格猛漲的影響，恐怕一時還不能印行出來，他依舊設法籌款，希望能够克服困難。相信讀者都希望能够趕快看到他的新著出現，再一次享受他那明朗而令人反覆咀嚼的散文。



琦君

琦君，原名潘希真，浙江永嘉人，民國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。杭州之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。曾任高等法院書記官、司法行政部科長，現任中國文化學院及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。從民國三十九年開始寫作。

琦君在高中時代便嘗試投稿，她的第一篇文章是在高一時投浙江青年的一篇：「我的好朋友——小黃狗」

，以第一篇的地位刊出，得到稿費銀圓二元六角，並且得到該刊的主編來函鼓勵，當時對她有很大的鼓舞作用，她決心以後要做個「文學家」。

可是大學畢業後，寫作却中輟下來，她因服務於司法界，文書案牘消磨了她寫作的雄心。在大學時候，她的老師曾諄諄勉勵她：「以汝之性情稟賦，若勉爲此業（指寫作），期以十年，必能有成，幸勿爲人間閒煩惱蝕其心血，勉之勉之。」她時時謹記這段勉勵，心裏常有一股創作的慾望。

直到遷來臺灣之後，因舉目無親，心情落寞，琦君乃毅然提起筆來，嘗試撰寫短文，她來臺後的第一篇短文題爲「時間·時間」，投給中央副刊，半月後便刊出了。她喜不自勝，又立即再寫一篇散文紀念她的恩師：「一生一代一雙人」，投給中央日報的婦女家庭，不久就刊登出來了。從此便奠定她寫作的信心，增加很濃的興趣，她繼續寫數十篇的散文之後，便又嘗試撰寫短篇小說：「姊夫」，在文壇月刊的創刊號以第一篇的地位發表，於是她又開始向短篇小說方面發展。

琦君的第一本結集「琴心」，是以自費出版的，當時出版之後，便有許多不相識的讀者寫讀後感推介她的著作，認作她寫鄉村生活及童年生活很樸素，有真感情。不過，她並不因此而感到滿足，她自覺到只停留在回憶童年，會使創作走向狹窄的道路，因此，她企圖從自己的生活圈子掙脫出來。她服務於司法界，每日可見到各種階層的人物，從他們身上正好可以反映出形形色色的生活面，她乃逐漸由個人身邊的瑣事圈中跳出，以哀矜勿喜的心情寫大機關中的小人物，把他們的「雄心壯志」，他們的善良和醜陋，以及被人們遺忘的苦難者的心聲，都以真摯的文字表現出來。民國五十七年出版的「繡校室八小時」，就是比較富社會性的小說，也是她較爲滿意的集子。

琦君的短篇小說數篇曾經譯成韓文，獲得韓國讀者的熱愛，民國五十二年二月，應韓國女苑雜誌社的邀請，去韓國訪問。同年五四文藝節，獲得中國文藝協會散文獎。民國五十九年，她的散文集「紅紗燈」，獲得中山學術基金會文藝創作散文獎。民國六十一年，應美軍太平洋總部的邀請，以友好訪問團員身份，訪問夏威夷

；又由美國國務院安排，訪美兩個月。

她現在擔任中央大學的兼任教授，對當代的中國文學勤於介紹，使當代的文藝創作打進學院裏面，對於目前的文學發展的貢獻是相當大的。讀者只注意到她在創作方面的努力，也應瞭解她在推展文學方面所做的默默的努力。

鳳兮



鳳兮，原名馮放民，江西九江人，民國八年一月二日生，國立復旦大學畢業。曾任中央周刊總編輯，私立復旦中學校長，臺灣新生報主筆。從民國二十七年開始寫作。

鳳兮主持的「中國文藝函授學校」，默默為中國文學培養繼起的一代，十餘年來，已有不少人從函授學校出來，這股力量是無形而鉅大的，為我們的文壇奠下穩固的基礎，他們有的已在獨立創作，有的則具有敏銳的眼光暗中審視文壇的動態。鳳兮很少談到他在這方面的努力，但不能否認的，他對中國文藝的推動是很有貢獻的。

他在學生時代，便分擔了這個民族的苦痛。民國二十年，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，全國悲憤，抗日情緒非常高昂，那時他已是一個初中的學生，每日閱讀報紙，看到日本侵略者步步向中國逼進的報導，往往情不自已，痛哭失聲。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已充滿了悲憤，他曾在一篇作文中寫下了如此的句子：「中華兒女誓雪國恥，揚國旗於富士，踏三島為坵墟。」當時他的國文老師非常激賞，在作文裏為之加圈加點，並且當面鼓勵了他，從此他對國文和寫作的興趣日益增濃。